

中国共产党
河南省淅川县组织史资料
(1938 ~ 1987)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

河南省淅川县组织史资料

(1938.7~1987.11)

中共淅川县委组织部
中共淅川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淅川县档案局

河南人民出版社

编 审 张俊成
副编 审 李聚鼎
主 编 李生林
 井自林
编 辑 王心富
 刘先民
 刘贵恩

淅川县组织史资料

中共淅川县委组织部

中共淅川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淅川县档案局

责任编辑 宋庭亮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新华一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15.5印张 336千字 插页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7-215-0/715-X/D·315

定 价： 22.00元

前 言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淅川县组织史资料》(以下简称《资料》),是遵照中共中央组织史资料编辑领导小组关于“广征、核准、精编、严审”的方针,以“存史、资治、育人”为目的,在中共淅川县委的领导下,由县委组织部、党史委、档案局三家通力合作,全体工作人员历时5个春秋编写而成。

本《资料》是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淅川县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县、乡(镇)两级组织机构沿革和有关领导人任职情况的专辑。这些翔实的记载,反映出自1938年7月至1987年11月,中国共产党淅川县党组织在近50年的时间里,所走过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所创出的业绩是灿烂辉煌的。这本《资料》对于总结党的组织工作的历史经验,编写地方党史,继承和发扬革命光荣传统,促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资料》内容主要来源于地、县的历史档案和老同志的回忆座谈,以及县直各单位、各乡、镇提供的志、史、文献资料、报表等。综合统计数字以县委组织部的档案资料为依据。

为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历史原貌,在编写该《资料》的整个过程中,全体工作人员态度严谨,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不畏严寒酷暑,四方奔波“广征”,夜以继日“核准”,聚神伏案“精编”,一丝不苟“严审”,使所收录的每个组织机构,每位领导人的任、离职情况,都尽力做到有案可稽,有据可依。

但是,由于该《资料》跨越的时间长,涉及的机构、人员多,且征集的材料有限,加之我们又是第一次从事这项工作,错误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在此,恳请革命老前辈和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编 者

凡 例

一、编纂体例

《中共河南省淅川县组织史资料》采用分时期、按系统合编与分编相结合的编纂体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资料合编，按党史分期分为“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两章；每章以党、政、军、群组织系统分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资料分编，按党史分期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章；每章以县委领导机构、县委工作部门、区（乡、人民公社）党委、政权系统党组、地方军事系统党委、群众团体系统党组分别立节，按党代表大会届次、机构变更或主要领导人变动分段。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在1984年升格后单独立节。政权、地方军事、统一战线、群团系统的组织机构和领导人名录，编排在党的组织史资料之后，按系统单独分章、分节编目。政权系统中的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根据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经过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不再作为县政府工作部门，采取分别立节编写。

组织机构中，凡实行委员制的，按委员、候补委员、常委、书记、副书记的顺序排列。不是委员制的，则按机构沿革、代表大会届次、结合主要领导人的更迭顺序分段，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候补委员依得票多少排列。

二、编纂形式

本《资料》采用文字叙述、机构人员名录和图表相结合的编纂形式。文字叙述部分包括：总的概述，章的综述，节的简述，机构建立或撤销时必要的简言以及代表大会简介，主要领导人更迭时的短语。机构人员名录包括：机构名称，起止时间，隶属关系，驻地及所辖组织，领导人职务，姓名，任、离职时间及必要的注释。图表包括：现行行政区划图，党组织沿革序列表，党、政工作部门设置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各时期党组织分布示意图,党、政主要领导人一览表,综合性的党组织、党员、国家行政干部基本情况统计表等。

三、收录范围

本《资料》收录1938年7月至1987年11月1日浙川县党组织和政权、军事、统战、群团系统的组织机构和领导人名录。所收录的人员均含同级的顾问、调研员。原属浙川县辖,现已划归外县管辖的组织机构,只在文字中说明,不列名录;原属外县辖区,现属浙川县管辖的组织机构,列在县辖同级组织之后立目记述。

(一)党的系统: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7月建立中共浙川区委,收录区委、支部、直属党小组和区委书记、副书记、委员,支部书记,党小组组长。1939年秋建立中共浙川县委后,收录到县委、区委、直属支部和直属党小组及其县委委员、书记、副书记;区委委员、书记、副书记;支部委员、书记、副书记;党小组长。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收录到县委委员、书记、副书记,工作部门的正、副职;各区委书记、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收录到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常务委员、书记、副书记,县委工作部门的正、副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书记、副书记;县人大、县人民政府、县政协党组成员、书记、副书记;地方军事系统党委书记、副书记;“文化大革命”时期县、人民公社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列入党的组织序列,收录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副组长、成员,人民公社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副组长。

(二)政权系统:新中国建立前,收录到县、区政权组织的正、副职。新中国建立后,收录县人大常委会及其主任、副主任;县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及其县长、副县长、顾问、县长助理和工作部门的正、副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县革命委员会,列入县政府序列,收录主任、副主任及工作部门正、副职。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机构及其正、副职。

(三)地方军事系统:收录到县大队,县人民武装支队部、县人民武装部、县兵役局的正、副职。

(四)统战系统:收录政协浙川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五)群团系统:收录县工会、农民协会、“民先”、青年团、妇联、工商联、科协、文联、侨联组织及其正、副职。

本《资料》还收录了中共浙川县各次(届)代表大会,浙川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浙川县各届人民代表大会的资料。

属于代管单位、临时机构、工矿和文教、卫生等企事业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不予收录。

四、有关问题说明

(一)各组织机构名称出现时,注明该机构的起、止时间,隶属关系,驻地及下辖组织。领导人任职时间与机构起止时间一致者,其名录后不注任、离职时间;中途任、离职者,注明任职或离职年月;中途既任又离的,任、离职时间均注明。

(二)机构中领导人任、离职时间月份不详者,注明季节。“文化大革命”前期,除县人民武装部组织机构及其正、副职外,县各级组织机构及领导人任职终止时间,全县统一定为1967年1月止。

(三)凡收录的组织机构名称,在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此后酌用简称。

(四)人员姓名用字,均使用其任职期间的名字,凡有别名、化名者加注;女性、少数民族、代职、兼职,以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权系统里的军、群代表,均在其姓名后加注。

(五)顾问,县、乡长助理,调研员,列同级现职领导人之后。

目 录

概 述	(1)
第一章 抗日战争时期 (1937.7~1945.8)	(7)
第一节 党的组织	(8)
一、中共浙川区委及所辖支部、直属党小组	(8)
二、中共浙川县委和所辖区委及直属支部、党小组	(9)
第二节 群众团体组织	(11)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浙川县组织分布示意图	(12)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浙川县组织沿革序列表	(13)
第二章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1945.8~1949.9)	(14)
第一节 党的组织	(15)
一、中共浙川县委员会	(15)
二、县委工作部门	(15)
三、县委所辖区委员会	(16)
四、浙川县现辖原属邓县、内乡县的区委员会	(16)
第二节 政权组织	(17)
一、浙川县人民民主政府、县人民政府	(17)
二、县政府工作部门	(17)
三、县政府所辖区公所	(18)
四、浙川县现辖原属邓县、内乡县的区公所	(19)
第三节 地方军事组织	(19)
一、浙川县大队	(20)
二、浙川县独立团	(20)
第四节 群众团体组织	(20)
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浙川县工作委员会	(20)
二、浙川县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	(20)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浙川县组织分布示意图	(21)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浙川县组织沿革序列表	(22)
第三章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1949.10~1966.5)	(23)
第一节 中共浙川县委和工作部门及所辖区、乡、中心乡、人民公社党组织	(24)
一、中共浙川县委领导机构	(24)
二、县委工作部门	(27)
三、各区(镇)、乡(中心乡)、人民公社党组织	(31)

第二节	政权系统的党组、党委	(44)
一、中共浙川县人民委员会党组	(44)	
二、中共浙川县政法系统党组	(45)	
三、县人民委员会工作部门党组、党委	(46)	
第三节	地方军事系统党委	(47)
	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川县人民武装部委员会	(47)
第四节	群众团体系统党组织	(47)
	中共浙川县群团系统党组	(47)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中共浙川县委工作机构设置表	(48)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中共浙川县组织沿革序列表	(49)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5~1976.10)	(50)
第一节	中共浙川县委领导机构、工作部门及所辖区(人民公社)	
	党组织	(51)
	一、中共浙川县委和工作部门及所辖各区委员会	(51)
	二、中共浙川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及所属各人民公社革委会	
	党的核心小组	(53)
	三、中共浙川县第三届委员会和工作部门及所辖各人民公社党委	(54)
第二节	政权系统党组、党委	(59)
一、中共浙川县人民委员会党组	(59)	
二、中共浙川县政法系统党组	(60)	
三、中共浙川县供销合作社委员会	(60)	
第三节	地方军事系统党委	(60)
	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川县人民武装部委员会	(60)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浙川县委工作机构设置表	(61)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浙川县组织沿革序列表	(62)
第五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1987.11)	(63)
第一节	中共浙川县委和工作部门及所辖人民公社、乡(镇)党组织	(64)
一、中共浙川县委领导机构	(65)	
二、县委工作部门	(68)	
三、人民公社、乡、镇党组织	(71)	
第二节	中共浙川县纪律检查委员会(1984.10~1987.11)	(79)
第三节	政权系统党组、党委	(79)
一、中共浙川县人大常委会党组	(79)	
二、县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党组、党委	(80)	
第四节	地方军事系统党委	(82)
	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川县人民武装部委员会	(82)

第五节 统一战线系统党组	(8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淅川县人民委员会党组	(82)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淅川县委工作机构设置表	(84)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淅川县组织沿革序列表	(85)
综合资料	(87)
中共淅川县委历任书记一览表	(89)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淅川县历次代表大会简介	(90)
淅川县1949年至1987年党组织基本情况统计表	(95)
淅川县1949年至1987年党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98)
淅川县1949年至1987年国家行政干部基本情况统计表	(101)
河南省淅川县政权系统组织史资料	(105)
河南省淅川县地方军事系统组织史资料	(199)
河南省淅川县统一战线系统组织史资料	(209)
河南省淅川县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	(215)
后 记	(235)

概 述

淅川县位于河南省的西南边陲,豫、鄂、陕三省交界处。东临内乡县、邓州市,南接湖北省的光化、均县,西毗湖北省的郧县和陕西省的商南县,北与西峡县为邻。境内西北部系崇山峻岭,地势较高,东南部岗峦起伏,渐趋缓平;丹江、淇河、滔河、鹤河、刁河分贯全境,顺阳川、板桥川、淅川、荆寺川平铺山间。全县总面积2798平方公里。其中,68.9%为山区、丘陵,17%是平原;亚洲第一大水库——丹江水库镶嵌在淅川腹地,因而水域面积占14.1%。辖区内山水相宜,气候温和。现有人口62.35万人。全县设城关、荆紫关、老城3个镇,寺湾、西簧、毛堂、上集、蒿坪、大石桥、滔河、盛湾、黄庄、香花、厚坡、九重、仓房13个乡,有513个行政村,3个居民委员会,共4730个村民小组。

淅川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全县人民富于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北魏时即设置淅川县。尔后,随着历史的演变,政区废置频繁。因其陆通秦晋,水连吴楚,故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千百年来,由于封建势力的残酷统治,土豪劣绅横行乡里,广大劳动人民困苦不堪;近代又有列强入侵蹂躏,帝、官、封三座大山更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

1921年7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神州大地现出了曙光,给淅川人民带来了希望。1929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即派一名共产党员到淅川发展组织;同年9月,淅川党的组织已在鄂北特委领导下建立。(具体组织情况待查)1931年夏,进步学生王景华、田国定、张俊成等,利用暑假,在老城、上集、荆紫关各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进行西征,途经淅川,军纪严明,打富济贫,发动群众,传播革命道理,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4年初,原属北方局所属组织的共产党员张明河、王正今发展了淅川县的吴怀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吴怀三先后在马蹬、宋

湾的乡村里，丹江两岸的船民中和上、下寺的和尚中间，培养了一批进步分子，为党组织在淅川县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5年6月，红二十五军奇袭了淅川县荆紫关镇，歼敌一个营，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同年8月，张明河等派人在荆紫关镇开设了“光慈”医院，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1936年1月，他们发动了邓西暴动，取得了胜利，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反动当局，鼓舞了人民群众。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中原沦陷区的河南大学、开封师范、开封女中、百泉乡师、战一师、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子弟小学等20多所学校，相继迁入淅川县。广大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行径义愤填膺，纷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2月，开封师范学生王煜（现名王留影）同秘密回淅川的共产党员宋藩舟取得联系。他们首先在开封师范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发展队员30多名。后根据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形势，公开建立了“抗日后方支援会”（后改称“淅川工作委员会”），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并开设了“暖流书店”，出售进步书籍。同年4月，开封师范进步学生张汉杰，陈泮水等人，自发成立了“洪流学社”，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当年5月，共产党员周尚杰（又名周涤尘、尚友）受党组织派遣，回到淅川县开辟党的工作。7月，建立了中共淅川区委。1938年8月，根据上级组织关于向西发展的指导思想，在湖北省均县建立了中共均县支部，发展党员5名。至此中共淅川区委辖7个支部、5个党小组。到1939年秋，已拥有党员128名。

随着党的工作开展，影响不断扩大，周尚杰的活动受到反动派的严密监视。中共河南省委了解情况后，及时将周调离，改派宋藩舟回淅川主持党的工作。1939年11月建立了中共淅川县委。到1941年底，中共淅川县委下辖5个区委、2个直属党支部、4个直属党小组，共有党员316人。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形势逆转。5月初，中共豫西南地委书记刘清源来淅川传达河南省委关于“隐蔽精干”的指示；淅川党组织当即就采取措施，部署隐蔽。当年11月，

因叛徒告密，宋湾区的共产党员姚秉廉、马士彦、马青彦和1名党外进步人士惨遭杀害。宋湾区委得知消息后，部分领导人复仇心切，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客观条件，于11月19日贸然发动了宋湾农民武装暴动。在行动前，由于发觉叛徒向敌人泄露了行动计划，便决定暴动时间提前。此时，党的武装力量不知计划有变，未能统一行动，结果导致暴动失败，使大部分党组织被暴露而遭破坏，部分党员被捕，多数党员被迫背井离乡。

1942年冬，国民党反动派组织的“伏牛山工作团”进入宛西，搜捕共产党员。淅川县地下党除撤退到延安和其它根据地的57人外，有18人被捕牺牲，168人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同年12月，共产党员黄从书、杨建基等带领30余名武装队员，攻打李官桥敌区公所，火烧民团营房，击毙敌连长2人。战斗中黄从书不幸负伤，于1943年在湖北省老河口被敌人暗害。

1945年4月，日本侵略军侵占了淅川县城，隐蔽下来的部分党员，采取打入敌人内部的方法，相机打击敌人。在时机成熟时，他们发动群众夺取了日军的面粉库，捣毁了西药房，火烧了弹药库，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1946年7月上旬，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部队实行战略转移，突破敌人重围，到达陕南后，派张忠回淅川开展革命工作，在滔河乡石庙湾村建立了秘密情报站，搜集敌人情况，为解放淅川县做出了贡献。

1948年5月6日，在中原野战军发起的宛西战役中，解放了淅川县城，9日宣布建立中共淅川县委（对外称政治部），同时建立了淅川县人民民主政府。同年6月，为剿匪反霸、稳定社会秩序，建立了淅川县大队。1949年2月，建立淅川县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8月，建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淅川县工作委员会。全县设8个区（不包括西坪区。1949年9月27日，河南省人民政府58号文件通知，将原属陕西省商南县所属的西坪区划归淅川县管辖。因当时局势尚不稳定，淅川县还未及派人接受，遂于当年11月，省政府又决定将西坪区划给新建的西峡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共淅川县委和淅川

县人民民主政府,肩负起建设新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历史使命。从1949年10月开始到1956年间,领导全县人民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开展了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以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及以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为内容的“五反”等运动,在农村先后组织了互助组,建立了初级社、高级社,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这些运动的锻炼,一大批党员、干部迅速成长起来,各级党、政组织逐步建立健全。1956年5月,在浙川县城(老城)召开了中共浙川县第一次(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浙川县第一届委员会。县委内设13个工作部门。这一时期,全县的行政区划,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1951年7月前全县设8个区;1951年7月至1955年9月为11个区;1955年9月后设7个区;1956年1月在7个区下面建立了24个中心乡,同年3月撤销区机构,保留中心乡。1957年1月,撤销24个中心乡,全县划设为8个区和1个县辖工作组。1958年5月,为适应“大跃进”形势的需要,撤销了8区、1组,全县新划设1镇、16个乡;同年8月,中共浙川县委设立书记处,全县行政设置改为16个人民公社。在这一阶段里,1957年以前,由于党的指导思想正确,浙川县的政治、经济形势发展比较好。1957年后,由于“左”的错误思想指导,特别是在1958年全民炼钢铁,在农业生产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县泛滥开来,给全县的政治、经济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带来了严重损失。1961年,中共浙川县委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认真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从组织上调整了社队规模,从经济上制定了分配制度,使浙川的政治、经济形势很快得到好转。1961年5月,经县委、县人委研究决定,撤销了原设的16个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在全县设立9个区;区机构下设64个规模较小的人民公社(镇)。随着全县政治、经济形势的良性发展,于1965年7月,在县城(上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浙川县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浙川县第二届委员会。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浙川县同全国一样，党、政、统、群各级组织受到严重干扰和冲击。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错误口号影响下，党、政、统、群机关处于瘫痪状态。在动乱的1967年夏，建立了“浙川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负责领导全县的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等工作。1968年5月，浙川县革命委员会建立，随之各基层组织的革命委员会也应运而生。1969年，在所谓的“民主整党”运动中，党的基层组织相继恢复，但却存在着严重的组织不纯问题。1971年4月，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了中共浙川县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浙川县第三届委员会。

由于丹江水库建成蓄水，自1968年以来，库区的居民分批搬迁，原有县内行政设置已不适应政治、经济、地理、人口、布局变化情况的需要。1968年5月，撤销了李官桥区，建立了香花人民公社，全县行政区划为8区、1人民公社。1969年4月，在上级“撤区并社”的指示下，全县撤销了8个区，连同香花人民公社在内，划设为13个人民公社。后于1972年12月，报经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将原属邓县所辖的厚坡、九重两个人民公社划归浙川县管辖。从这时起，全县辖15个人民公社。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浙川县在各个方面开始清除“左”的影响，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浙川县委认真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得力措施，使浙川的面貌焕然一新。经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先后进行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清理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落实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从而纯洁了党政各级组织，建立健全了组织机构，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同时吸收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的肌体增添了新鲜血液，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全县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胜利地步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82年7月，在浙川县城(上集)召开了中共浙川县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浙川县第四届委员会。

1985年12月，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浙川县

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浙川县第五届委员会。

为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于1984年10月,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升格,改为中国共产党浙川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自1976年10月到1987年11月,全县的行政区划是:1981年7月以前,设15个人民公社;1981年7月,新增建了城关镇,全县为1镇、15个人民公社。1983年12月,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县级党政机构改革的要求,全县的15个人民公社改设为乡,划设1镇、15个乡。1986年6月,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报请上级批准,原荆紫关乡、老城乡分别改设为镇。自此全县划设为3镇、13乡。截止1987年11月底,全县建立了31个基层党委,14个党总支、876个党支部,有党员15093名。

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使领导班子朝着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1985年3月至1987年7月,全县自上而下地逐级开展了全面整党。广大党员通过整党教育和学习,提高了政治素质,增强了组织纪律性,转变了工作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为新时期党的思想、组织、队伍、制度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全面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中共浙川县委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建设一起抓的方针,使全县在政治上实现了安定团结,经济上稳步发展,整个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如今,全县人民在中共浙川县委的正确领导下,为促进浙川县早日脱贫致富,经济全面振兴,而脚踏实地的开拓前进!

第一章

抗日战争时期

(1937.7~1945.8)

1938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派遣“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共产党员周尚杰(周涤尘、尚友)回浙川开辟党的工作。周回浙后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积极进行工作。7月，建立了中共浙川区委。8月，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把组织发展工作延伸到湖北省的均县，建立了中共均县支部。至1939年11月，先后建立了7个支部、5个直属党小组。

1939年秋，周尚杰的活动受到了国民党地方反动当局的注意和秘密监视，中共河南省委及时将他调离到根据地，指派共产党员宋藩舟回到浙川主持党的工作。同年11月，在宋的领导下，党的队伍发展壮大，建立了中共浙川县委，并陆续建立了5个区委、2个直属支部、4个直属党小组。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豫东、豫北大部分地区沦陷。这时，开封师范、商丘中学、潢川中学和省立一小等20多所大、中、小学被迫西迁到淅川县。广大青年学生、教职员有家不能归，深感亡国失土之苦，抗日情绪异常高涨。淅川县地下党组织把握时机，因势利导，在各学校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在开封师范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组织青年学生学习革命理论、编演革命文艺。而后利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公开建立了“抗日后方支援会”，以此为掩护，对地方反动当局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一些反动分子被免职，从而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党的组织，培育了一批积极分子，为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输送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当局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形势急转直下。同年6月，豫西南地委书记刘清源来淅川传达省委关于“隐蔽精干”的指示，宋藩舟等领导立即安排部署，淅川地下党转入隐蔽活动。当年11月，由于几位党员被叛徒出卖而被捕牺牲，中共宋湾区委少数领导人复仇心切，违背“隐蔽精干”的方针，贸然发动了宋湾农民暴动。加之计划不周，叛徒告密，结果招之暴动失败，造成不良后果，暴露了党的地下组织，使党的力量遭受到严重损失。

1942年冬，国民党特务组织“河南省党政军伏牛山工作团”进驻宛西，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淅川县共有18名党员被残杀，5名党员被追捕而逃离家乡，168名党员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57名党员撤退到延安等地，外地党员回原籍的18名。